

“红色学府”是如何炼成的

——1920 年代的上海大学

本报记者 于颖

同一个校名，将穿越时空的两所大学连接在一起。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在短短5年时间内六迁校址，是所名副其实的“弄堂大学”、“陋校”。但那里集聚起来的良师、培养出来的英才，却狠狠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的方向。

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正门进入，没多远就能看到东侧的“溯园”。沿着入口往里走，弧形墙体一圈一圈向内下沉延伸，直至中心的校址地图广场。地面铺设的青砖碎石小道以及带木纹的灰色墙体，使得这番细数年轮般的体验，更显庄严非凡。

作为上海大学博物馆校史陈列的室外展示区，“溯园”音同“溯源”，取“追根溯源”之意，是为纪念20世纪20年代的老上海大学（1922—1927年）而建的。高低起伏、疏密相间的墙体，以大事记的方式，讲述了老上大从建校、几度搬迁直至被迫关闭的波澜岁月，上面还郑重地刻着老上大的大学章程和所有师生的名字。几组浮雕作品重现了老上大所经历的重要历史时刻，也让我们在建党初期的革命浪潮中更清晰地找到了这座被誉为“红色学府”的历史坐标。

于右任邀请共产党协助办校

1920年代初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全国各地学潮不断。1922年春天，位于上海闸北青岛路（今青云路）弄堂里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长王理堂，打着“提倡新文化”的旗号，鼓吹学校已聘任了陈独秀等名人学者，招生敛财，最终引发学潮。彼时，不少学生已经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力促校方改组，并提出可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中的一位担任校长。章当时隐居苏州，陈的行踪捉摸不定，于右任便成了最佳人选（张元隆《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

其实，陈独秀当时就在上海，以他作为领导人的新成立的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很可能在这次学潮和改组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茅盾在回忆中就有过这样的表述，“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还有“中央考虑之后提出请国民党出面



▲《上海大学章程》

◀“溯园”还呈现出了于右任题写的老上大办学宗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

办学的意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但据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长林介绍，这一说法与亲历者——上大学生、青年团员嵇直等几人的回忆有些出入，“而且有资料显示，如果东南高师学生知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很有可能不会提议他做校长”。所以刘长林认为，茅盾关于学生找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考虑的回忆，为一孤证，尚有待进一步的史料证明，“但上海大学创建后的教师选派方面，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通过组织，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

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民国日报》刊发《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在当时国民党处于低潮、积极寻求国共合作这一大背景下，校长于右任毫无疑问对任何“有主张、能奋斗之士”都寄予了厚望。1923年春，他和副校长邵力子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京津菜馆宴请来沪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并邀请其协助办校。乐嗣炳就曾回忆说，受邀的李大钊因北方工作走不开，“后经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讨论，把上海大学作为党的干部学校，李大钊就介绍邓中夏来办上海大学”（乐嗣炳

《回忆上海大学》）。

虽然刘长林在常年的史料蒐集中，并没有找到中共将上海大学作为党办学校的正式决议或文件，但是，“从上海大学的实际办学效果、历史贡献和社会影响来看，革命学府、红色学府的头衔当之无愧”。

邓中夏、瞿秋白功不可没

在把这所“弄堂大学”打造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高等学府的过程中，邓中夏、瞿秋白二人功不可没。邓中夏时任上海大学校长，他在为上大拟定的章程中，明确“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教务长瞿秋白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强调“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传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至此，上海大学设有社会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社会学系凝聚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比如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施存统、安体诚等，并且首开国内高校之先河，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引进

课堂、编进教材、武装学生。

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他学识渊博、教学灵活、态度和蔼，为了给学生解释清楚问题，还多次在课后去学生宿舍讲课。早年毕业于社会学系的刘昶曾撰文回忆说瞿秋白非常受欢迎，“不仅外系的同学，甚至本校的好老师恽代英、萧楚女也来听课。教室容纳不了，只好站在窗外听课和做笔记”。

恽代英讲授国内政治、国际问题等课程。大热天里，滔滔不绝的他有时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有学生端茶倒水、送手帕给他擦汗，他还笑着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习惯用这个东西。”当时，恽代英还担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就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及撰写文章。蔡和森则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两书编成讲义，讲授社会进化史。彼时，这两本书还没有中译本，他的讲义经过整理后，作为上海大学丛书之一，后由民智书局出版。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虽然没

有在上大担任教职，但非常重视和关心学校的发展，在1923年4月到11月来沪期间，数次到上大作讲演。1923年4月15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了《演化与进步》一讲，说到“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1月，李大钊又分别作了《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概论》《劳动问题概论》3个演讲，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释，鼓励青年奋发向上，追求社会进步。包括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等授课讲义，后来都整理成书，由上海书店出版。此外，当时的报刊杂志如《民国日报》或其副刊《觉悟》，也刊登了一些演讲和讲义内容，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大钊的《社会主义释疑》、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等等，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激发社会用马克思主义认

（下转 10 版）➡